

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決策的 分析和反思

• 沈志華

摘要：朝鮮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介入的第一場對外戰爭。本文主要分析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決策所涉及的三個問題：首先，1950至1951年中國的主要軍事目標是解放台灣，在收復台灣前不願意看到朝鮮戰爭爆發。在蘇聯和朝鮮已經商定對韓國採取軍事進攻的情況下，毛澤東被迫做出了支持發動戰爭的決策，就戰爭爆發而言，是蘇聯和朝鮮綁架了中國。其次，在美國對戰爭進行干預後，毛澤東即主張出兵援助朝鮮，其決策過程雖然曲折，目標和動機也有變化，但最根本目的在於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借助中蘇同盟的威懾力和蘇聯的援助，穩固新生的革命政權、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再次，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突破三八線並已達到原定目標的情況下，中國錯誤地認為可以取得全勝，因而拒絕聯合國的停火議案，錯失了實現停戰的有利機會，結果陷入全面被動。中國出兵朝鮮達到了所有預設的目標，是合理的、正確的決策，問題出在沒有抓住最有利的時機及時收兵。

關鍵詞：出兵決策 朝鮮戰爭 台灣戰役 中美關係 中蘇關係

朝鮮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介入的第一場對外戰爭，這一決策的結果，對於中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戰後亞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朝鮮半島則從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成為世人關注的火藥桶。對於中國來說，朝鮮戰爭作為一個分水嶺，最終確定了新政權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走向，甚至確定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道路。惟其如此，這場戰爭才成為國際學界和中國學者經久不衰的研究課題，也是中國坊間津津樂道的談資。

* 基金項目：韓國教育部韓國學研究「重點大學」計劃——「關於近現代中韓關係世界高水平研究教育體系的構建」(AKS-2021-OLU-2250005)。

中國介入這場戰爭的決策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戰爭策劃和爆發時的決策；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決策；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三八線)、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的決策^①。由於檔案和重要史料的缺乏，過去有關中國決策的很多基本史實都弄不清楚^②。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還有西方學者哀歎：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真實「決策過程」可能永遠都無法得知^③。然而，隨着中國檔案文獻開始系列性地編輯出版^④，與此同時，蘇聯與中國之間關於朝鮮戰爭的往來函電也在俄羅斯大量披露，這些文獻對於了解中國決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不亞於中國本身的檔案^⑤。在此基礎上，冷戰結束後出現了大量關於中國參戰的研究論著，中國在戰爭中決策的主要過程已經愈來愈清楚，目前研究者對基本史實的認定也有共識，儘管對一些文件的理解還存在差別^⑥。

顯然，只有在對基本史實形成大體共識的基礎上，研究者才能展開對中國決策目標和動機的討論，對決策結果的評判。不過，必須承認，對於中國決策目標、動機和結果的判斷存在很大困難，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決策程序的獨斷性和保密性。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多缺乏系統的決策文件，尤其是在中國，很多決策過程甚至沒有任何文字記錄^⑦。即使存在一些決策性文件，其保密規定也令研究者望而卻步。而那些已經公開的文件，研究者則需要認真區分，哪些是決策者的真實想法，哪些是用以說服執行者和鼓動民眾的表面理由。儘管如此，歷史學家仍然要在掌握基本史實的情況下，對決策目標和動機做出推斷，對決策結果作出評判，否則就無法將歷史進程的鏈條連接起來。此外，朝鮮戰爭還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話題，「政治正確」對各國研究者都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在中國固然如此，即使在以「民主國家」自居的美國，朝鮮戰爭也曾「被高度政治化」、「惡性政治化」^⑧。因此，歷史學者只有鼓足勇氣，突破意識形態的藩籬，堅持客觀中立的理念，才能去尋求真實的歷史和正確的歷史記憶。

本文參與關於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決策問題的討論^⑨，目的在於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於中國在戰爭期間的一系列決策進行檢討，尤其是面對國際政治危機，應該如何交替採取軍事與外交手段，及時實現戰爭與和談的轉換，從而把握時機，減少代價，消除危機及其可能帶來的消極後果。

一 關於朝鮮戰爭的爆發

關於戰爭發動者的問題，冷戰時期一度出現的「南方入侵」的說法在朝鮮以外已經不復存在，美國修正學派的「內戰說」在西方學界也大致銷聲匿迹^⑩。面對大量無法否定的史實，目前學術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這場戰爭是在蘇聯和中國的同意、支持和幫助下由朝鮮發動的^⑪。但是，斯大林為甚麼同意和支持發動這場戰爭？這與蘇聯的對華政策之間是一種甚麼關係？特別是中國對於這場戰爭究竟持怎樣的立場和態度？這些問題在研究者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爭議。

關於斯大林同意發動戰爭的原因，目前學界常見的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為了「推進亞洲革命」，即由於蘇聯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下簡稱「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使斯大林看到了根據中國經驗在亞洲推進革命的希望和機會，通過在朝鮮發動戰爭，可以減輕蘇聯因封鎖柏林失敗在歐洲面臨的壓力，並壓制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擴大蘇聯在東亞的勢力。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1950年1月12日關於朝鮮半島不在美國防禦範圍的演說不過是為此準備了另一個條件——美國直接干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②。第二種是為了「防止中國與美國接近」，即由於斯大林擔心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Josip B. Tito），因此通過挑起軍事衝突令美國陷入戰爭泥沼，再讓中國捲入其中，從而阻止中國與美國和西方接近，把中國牢牢地綁在蘇聯的戰車上^③。

上述兩種解釋都存在某種缺陷。第一種解釋的前提是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以後，蘇聯的冷戰戰略（至少在亞洲）已經由防禦轉為進攻。這與基本史實不符。儘管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但直到1950年初斯大林仍然十分謹慎，蘇聯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整頓和清洗還在進行中（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完成），雖然鼓勵日本、印度和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加強反美鬥爭，但並沒有提倡「武裝暴動」，更沒有真正認可和推廣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經驗（對劉少奇在世界工聯會議講話的認可和宣傳不過是為簽署中蘇同盟條約做鋪墊的一時之需），斯大林拒絕毛澤東成立「東方情報局」的建議就是證明。如果說在朝鮮採取的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嘗試，是一盤「大棋」落下的第一子，那麼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斯大林對亞洲革命已有「通盤」考慮。

關於第二種解釋，斯大林的確擔心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接近，也忌憚毛澤東成為不聽話的屬下和盟友，這一點沒有任何疑義。但是，如果認為斯大林想通過發動朝鮮戰爭來達到這一目的，則在邏輯上說不通。首先，1950年1月13日蘇聯退出聯合國安理會是與中國領導人充分協商後採取的有準備的措施，其目的是期望毛澤東感恩戴德，在中蘇同盟條約下一步談判中作出讓步，而絕非有意將中國隔絕於國際社會之外，更說不上是發動戰爭的前奏。其次，斯大林與金日成在商定採取軍事行動的計劃時，預計的是美國不會或來不及進行武裝干涉；讓朝鮮去尋求中國的支持和幫助，只是為出現萬一情況下準備的後着而已。最後，戰爭初期毛澤東和金日成向莫斯科建議中國可以提供軍事援助，而斯大林一再拒絕中國出兵，就是考慮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能使戰爭擴大化。實際上，在朝鮮發動戰爭並非斯大林「深思熟慮」的預先計劃或戰略構想的一部分，而是臨時決定的緊急措施。

已經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整個1949年，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反對金日成對南方發動武裝進攻^④。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給平壤發電報，第一次表示可以考慮金日成的要求。4月8日金日成秘密到達莫斯科，與斯大林商定了發動戰爭的日期。5月13日金日成訪問北京，要求毛澤東同意朝鮮採取軍事行動。在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後，15日毛澤東表示支持金日成發動進攻。6月25日，在中國不了解具體計劃也未事先得到通知的情況下，朝鮮戰爭爆發。因此，

問題就集中在1950年1月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顯然，這裏最值得注意的國際背景是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特別是在談判過程中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對艾奇遜演說進行反駁的方式引起的中蘇之間的分歧和不快；簽署〈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引起的中蘇之間的矛盾和爭執。正是這兩個事件的發生，導致斯大林匆忙做出了為金日成開「綠燈」的決定。

毛澤東訪蘇期間在是否簽訂新條約的問題上與斯大林發生爭執，甚至一度閉門不出，引起美國和西方的關注^⑮。前面提到，1950年1月12日艾奇遜發表長篇演說，指出在歷史上侵害中國主權和利益的不是美國而是俄國，蘇聯已經和正在吞併中國的蒙古、新疆和滿洲，其主旨是挑撥中蘇關係。演說還提到，台灣和朝鮮半島都不在美國太平洋防禦線之內。這與5日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宣布美國無意使用武力干預台灣局勢的說法一脈相承，重點是表明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而朝鮮半島只是順便提到而已^⑯。這些公開講話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覺，他一直對毛澤東不放心，現在美國趁中蘇談判出現分歧之際趁機挑撥，更讓他不安心。幾天後，斯大林又看到來自蘇聯駐華使館的情報：美國擔心「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希望借助貿易讓中國在經濟上依附美國，然後「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美國正在利用英國承認新中國的機會進行試探，「以建立未來同人民政府的關係」^⑰。與中國建立同盟是蘇聯亞洲安全戰略的基礎，美國人這樣做無異於釜底抽薪，因此斯大林非常重視中國對此事的態度。

新中國的頭等大事，除了鞏固政權，就是解放台灣。早在1949年夏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時，毛澤東就提出請蘇聯幫助解放台灣的要求^⑱。新中國建立後周恩來即向蘇聯通報，進攻台灣的戰役安排在1950年9至10月^⑲。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訪蘇的第一天，又提出解放台灣問題，斯大林答應給予幫助^⑳。毛澤東不會看不出美國人的用意，但他在1950年1月17日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B. M. Молотов)會談時卻特意提出美國是否在台灣問題上釋放「煙幕彈」的問題，這說明中國的關注點與蘇聯有所不同。莫洛托夫明確指出，美國是「借助欺騙和誹謗在蘇中關係方面造成隔閡」，並要求中國以政府名義發表聲明，予以駁斥^㉑。儘管毛澤東已經明確答應按照莫斯科的安排，以外交部名義發表駁斥美國的聲明，但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刊登的卻是新聞總署署長的聲明。斯大林為此非常惱怒，當面指責毛澤東自行其是，沒有「信守諾言」，並認為中國以個人名義發表的聲明「一文不值」^㉒。毛澤東為甚麼沒有「信守諾言」？有可能是「不願意聽從莫洛托夫擺布的意氣用事」，但也有可能是有意為中美關係留下轉圜的空間。斯大林寧願相信後者。

既然美國的意圖是以表明不向國民黨提供援助和保護來拉攏中共，那麼蘇聯當然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停止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以阻止其解放台灣。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之後，周恩來就催促蘇聯盡快按照協定提交海空軍訂貨。隨着進攻台灣的時間推遲到1951年，中國又要求增加軍事訂貨（主要是飛機和軍艦），並一再請求蘇聯按照計劃及時提交。毛澤東甚至親自給斯大林本

人發電，請求蘇聯按照協定規定的期限發貨²³。然而，蘇聯採取了各種辦法拖延交貨，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國為準備發動台灣戰役（含進攻沿海島嶼）所需的飛機、軍艦及主要設備、器材均未運達，而海軍訂購的所有飛機和海岸炮以及大部分艦船直到1951年初也沒有發貨²⁴。毛澤東不願意金日成發動進攻，主要就是希望在遠東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前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²⁵。而在斯大林看來，正如美國學者斯圖克（William Stueck）指出的，蔣介石在中國的最後堡壘一旦被清除，「美國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提升」²⁶。所以，阻止中共解放台灣就能達到防止中美關係緩和的目的，而趕在台灣戰役之前打響朝鮮戰爭則成為阻止中共解放台灣的重要手段。其實，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和中國是否一定會參戰，斯大林並沒有任何把握，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行動將阻止中共佔領台灣。

不過，阻止中共佔領台灣並不是斯大林同意發動朝鮮戰爭唯一和主要的目的，道理很簡單：只要蘇聯繼續停止向中國提供飛機和軍艦，後者進攻台灣的軍事行動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就不會發生。所以，斯大林在1950年初甘願冒風險，突然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應該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和目標。這就涉及在中蘇同盟條約談判中引發雙方矛盾的另一個事件——關於旅順海軍基地和遠東不凍港的問題。

1945年8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後，大連地區實際上成為蘇聯的「國中之國」，旅順港實際上成為蘇聯的軍事基地，而中國長春鐵路（中長鐵路）則由中蘇共同佔有和經營，為期三十年。毛澤東對此非常不滿，希望通過簽訂新條約取消蘇聯在中國的這一特權。然而，作為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旅順基地以及與此關聯的大連港和中長鐵路構成蘇聯在遠東地區地緣戰略利益的基礎和保障。斯大林被迫同意毛澤東廢除舊約的主張後，蘇聯組織大批專家，重新起草了包括中蘇同盟條約、貸款協定、股份公司議定書等雙方談判可能涉及的十二份文件草案²⁷。為了維護蘇聯既得利益，根據這些文件，包含在舊條約內的原中長鐵路協定繼續有效，原旅順口協定和大連港協定則待簽訂對日和約後再重新審議，只是蘇聯駐軍應從1950年開始撤出旅順基地。毛澤東此前提出的要求是廢除對中國主權有所侵害的舊條約，但蘇聯駐軍可以暫時保留，等中國有了自己的海軍和空軍後再行撤退，而蘇聯的處理意見與中國的想法恰恰相反。經過短時間的談判，中國基本接受了蘇聯起草的同盟條約，但對旅順口、大連港和中長鐵路問題卻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方案。

1950年1月26日，周恩來向蘇方提交了臨時起草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的草案。其中的要害條款是：第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國。第二，目前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第三，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後，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²⁸。看到這個文件，斯大林的驚訝和憤怒可想而知，在一份批註「斯大林不同意」的俄文譯稿上，中方原文的內容幾乎被刪改無遺²⁹。然而，28日蘇方返回的修改稿卻基本接受了中國的草案³⁰。斯大林當然知道，無論如何

他也不能讓毛澤東空手而回，因為這正是美國人期待的結果，但斯大林也無法接受失去蘇聯通向太平洋唯一的出海口和不凍港的結果^⑳。那麼怎樣才能擺脫這個困境呢？

筆者推斷，很可能是中方草案中的這樣一個條款啟發了斯大林：「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的侵略而出現戰爭時，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議及蘇聯政府同意，中蘇兩國可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基地，以利共同對敵作戰。」在接受中國草案的同時，蘇聯在修改議定書時又增加了一條：「蘇聯的軍隊和軍用物資將自由地從滿洲里車站到綏芬河車站以及沿中國長春鐵路往返調運。」^㉑這就意味着，一旦遠東地區發生戰爭，蘇聯海軍仍舊可以留在旅順基地並使用中長鐵路，有關的舊協定則自然得以恢復。於是，1月30日，斯大林向金日成發出了前文所說的那封同意他採取軍事行動的電報。隨後，發動戰爭的計劃便緊鑼密鼓地制訂出來了。所以，與以往人們的想像不同，在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中，不是毛澤東而是斯大林被迫做出了重大讓步，以至蘇聯可能很快就要失去其亞洲戰略的基礎。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結果也不是表面上顯示的那樣鞏固了中蘇關係，而是引起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猜疑和不滿。為了保障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斯大林既要維持與中國的同盟關係，又必須保留通向太平洋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凍港。而根據中蘇雙方的協定，只要遠東地區出現緊張局勢，中國就必然要求蘇聯軍隊留在旅順基地，也只有依賴中蘇同盟條約來保證自身安全。至於軍事衝突的地點，既然如上所述蘇聯不願看到中國攻佔台灣，那麼斯大林的選擇就只有朝鮮半島了^㉒。

剩下的事情就簡單多了。蘇聯與朝鮮商定發動戰爭的計劃後，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指令於5月13日秘密訪華，要求中國予以同意和支持，斯大林也來電表明態度。作為「武裝奪取政權」這一革命方略的倡導者，毛澤東自然不能提出反對意見。中國所能做的，就是抓緊台灣戰役的準備，希望能在朝鮮發動戰爭前攻佔台灣。然而，金日成離開北京後四十天朝鮮戰爭就爆發了，而且美國立即出兵干涉。此時，毛澤東要面對的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朝鮮戰爭爆發雖然確是中、蘇、朝三方的「傑作」，但在這個問題上三方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朝鮮始終積極主動，蘇聯中途改變立場，而中國是在最後一刻表示支持的^㉓。史實證明，在發動戰爭的問題上，是朝鮮和蘇聯一起綁架了中國，而毛澤東則很不情願地接受了一個既成事實。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我多次說過，不可以打，應該估計到帝國主義會干涉。但金日成「已經決心打了」，斯大林也同意了。既然兩國已經同意，「我堅決反對，也是不行的」^㉔。

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毛澤東從中共和中國的利益出發，自然不願意看到在朝鮮發生戰爭（特別是在收復台灣之前），但作為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成員和亞洲革命的負責人，他又不得不遵從莫斯科的意願，不得不照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整體利益。對於毛澤東而言，這與其說是自己做出的決策，還不如說是被迫做出的選擇。歸根結底，朝鮮戰爭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和複雜的國際背景，但引起戰爭爆發的具體原因，則在於：一、斯大林要

維護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地緣戰略利益——與其衝突的不僅有敵人還有盟友；二、中蘇同盟的內部張力和矛盾——這一點在中國出兵問題上也有所反映。

二 關於派遣志願軍赴朝作戰

關於中國派遣軍隊入朝作戰的目標和動機，大概是朝鮮戰爭研究中爭議最大的話題。冷戰時期（特別是前期）的學術討論受意識形態的干擾較大，不過在西方影響最強烈的還是懷廷（Allen S. Whiting）在《中國跨過鴨綠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一書中提出的「安全威脅論」，即中國出兵是對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的必然反應^⑥。這一論點的基本邏輯在於中國決策是對美國政策的「被動回應」，是在外界壓力下做出的^⑦。對此，陳兼提出了一個與「美國中心論」不同的、更為合理的解釋框架：作為一個「新興的革命大國」，中國的決策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由於中共的革命理念、革命外交以及對新政權國家利益和世界革命命運的關注，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是主動的，「幾乎是無法避免的」^⑧。這個新的解釋框架引發了後冷戰時期學界對中國出兵決策問題更加熱烈的討論，因為即使在同一邏輯的軌道上，人們對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目標和動機也有各種各樣的推斷，如中國革命內在動力的驅使；承擔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履行中共的國際主義義務；保障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對國內政治動向的擔憂；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等等。不可否認，這些推斷都有各自的依據和道理，而筆者想要補充的只有一點：中國出兵決策的過程雖然只有四個月，但其中充滿變數；隨着國內外環境和條件以及戰局的變化，中國出兵決策的動機和目標也有不同，即使有些因素一以貫之，其在決策選項中的優先地位也有變化。

已經眾所周知的歷史過程如下：1950年7月2日，中國主動提出派兵入朝的問題。當時中蘇達成一致意見，如果需要援助朝鮮時，中國出陸軍、蘇聯出空軍。8月下旬和9月中旬，中國兩次提出派兵化裝成朝鮮人入朝作戰，金日成表示接受，但始終未能得到斯大林的首肯。直到9月底朝鮮人民軍（人民軍）全軍覆沒，斯大林才在10月1日要求中國立即出兵。毛澤東最初主張馬上派兵入朝，但多數中國領導人對此有異議。在4至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與會者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志願軍，定於15日參戰。但在10日的黑海會談中，斯大林要求中國陸軍先行入朝，蘇聯空軍兩個半月以後再出動，周恩來和林彪拒絕接受蘇聯的主張。雙方遂決定放棄朝鮮，並於11日發出斯大林、周恩來聯名電報通知毛澤東，要中共中央做出最後的選擇。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志願軍出國作戰方針不變後，毛澤東通知斯大林和周恩來，中國軍隊可於19日先期出動，要求蘇聯空軍和武器裝備務必在兩個半月後到位。得到中方的答覆和要求後，斯大林讓莫洛托夫通知周恩來，蘇聯可以提供武器但空軍不會入朝作戰。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中國軍隊如期參戰。19日晚7時，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秘密入朝作戰。

總體看來，雖然中國領導層確實出現過意見分歧和猶豫不決，但毛澤東本人始終堅持必須出兵援助朝鮮。綜合分析各種史料，中國（主要是毛澤東本人）關於出兵朝鮮的決策動機大致有四個方面：一、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朝鮮）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二、由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而引發的對抗美帝國主義的革命激情；三、對中國邊境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四、維護中蘇同盟的戰略態勢以保障新生革命政權的鞏固。隨着戰場形勢和蘇聯態度的起伏變化，中國出兵決策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也不斷發生改變，因此決策者必然會審時度勢，隨機調整決策目標，其決策的動機自然也會出現多方面的考慮，其中第一點是貫穿始終的，而其他三點則集中表現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

第一個節點，從美國宣布參戰到仁川登陸前。美國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特別是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阻斷了毛澤東解放全中國的宏偉大業，此舉無異於對新中國宣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仇恨和接受挑戰的決心，早在杜魯門宣布對台新政策時就已產生。從這時起，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與美國人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啟。在美軍登陸仁川前，人民軍尚佔有戰場優勢，但也有被敵軍切斷後路之憂。中國軍隊此時化裝成人民軍入朝作戰，在軍事上最為有利；而盡早結束朝鮮戰事，既可解除東北邊境地區的安全隱患，也可以集中精力處理中國內部問題。

第二個節點，從仁川登陸成功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前。此時人民軍主力陷入重圍，戰局出現逆轉，迫切需要中國的援助。而中國軍隊及時入朝作戰，既可以鼓舞朝鮮的民心和士氣，又可以在三八線附近建立一道防線，阻斷聯合國軍繼續北進。從現在披露的美國檔案文獻看，如果志願軍公開宣布出兵朝鮮，甚至可以打消美方越過三八線的念頭^⑨。這樣，實現戰爭「局部化」，既可解救朝鮮於危難，又可保障中國之安全。

中國在以上兩個時段出兵，都沒有太大的風險，在軍事上也比較有利，所以在決策層沒有明確的反對意見。然而，斯大林就是不同意中國出兵。原因很簡單：朝鮮本是蘇聯的衛星國，如果幾十萬中國軍隊進駐，即便取得勝利，又如何保證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控制和主導，如何實現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利益？然而，如果三八線被突破，朝鮮就要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其結果必將直接威脅蘇聯的遠東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也必須讓中國出兵與美國作戰。以毛澤東的智慧，何嘗不知中國出兵是在為蘇聯火中取栗，那麼他為甚麼要力排眾議，堅持志願軍出國作戰？

第三個節點，從10月1至10日。人民軍全面潰敗，三八線已被突破，中國出兵在軍事上的有利條件不復存在，所以多數中國領導人表現出擔心和猶豫。但是在毛澤東看來，亞洲革命領導者的責任和國際主義義務仍在，再加上對解除中國邊境安全威脅的考慮，中國必須出兵。何況，在蘇聯提供現代化武器裝備和出動空軍協同作戰的條件下，中蘇聯手抗擊美國，在軍事上也還是有一定把握的。毛澤東在4至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是如此說服大家的，前提是中蘇共同與美國作戰。

第四個節點，從10月11至18日。斯大林表明態度，寧願放棄朝鮮，蘇聯也不會出動空軍入朝作戰。中國陸軍單獨出兵對抗美國海陸空三軍，毫無取

勝的把握。但此時毛澤東仍堅持必須出兵，從軍事上考慮，採取堅守待援的方針或許還可以起到將「國境線」向南推移以保障邊境安全的目的。但其危險在於，如果初戰不利，被美軍打回，反而會「引火燒身」。所以，毛澤東提出「即令打不過美國」也要打^⑩，所考慮的主要就不是東北邊境的安全問題了。從11日周恩來和斯大林聯名電報的用語「等待您的決定」就可以看出^⑪，斯大林決定放棄朝鮮是非常不情願的，如果中國真的不出兵，勢必會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而當時中共鞏固新生革命政權的關鍵就是要取得蘇聯的支持和幫助。試想，新中國已經與美國為敵，現在再得罪蘇聯，如何生存和發展？即便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此時能夠發揮作用的，也不僅僅是中國的軍事能力，而需要蘇聯的軍事援助和中蘇同盟條約的威懾。毛澤東的判斷是，只要中國出兵，就會贏得斯大林的信任，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

以上歷史過程表明，隨着戰場形勢和蘇聯態度的變化，毛澤東關於中國出兵決策的目標不斷發生改變，決策動機也是多重的，但出國作戰、抗美援朝的決心和方針卻是貫穿始終的。從根本上講，這一決策不是斯大林逼迫的結果，而是中國與蘇聯遵從了同樣的革命理念和思維邏輯。

三 關於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

不像前兩個問題，關於1951年初志願軍越過三八線、中國政府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的決策過程和動機，學術界的討論相對較少。中國外交部檔案的開放，為研究者探尋答案提供了有利條件。

美國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中國會在非常不利的國際環境和軍事條件下出兵朝鮮，再加上急於結束戰爭，回家過節，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部隊輕敵冒進，一路北上，陷入了志願軍的重重包圍，最終被迫撤退。1951年1月初，中朝聯軍輕鬆越過三八線，再次佔領了漢城(今首爾)。這時，聯合國修改了此前的停火議案，在原則接受中國條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新的議案，並於1月13日交給中國政府^⑫。

實際上，在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又稱「第一委員會」)投票之前，印度大使已經在1月10日將新議案以備忘錄的形式轉交給中國政府，並徵求意見。周恩來立即起草了一個備忘錄，經毛澤東修改後交給蘇聯。中國認為，議案中仍堅持「先停戰後談判」，其意圖是讓美國「保存實力並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區和武裝資本」，而將談判「無限期拖延下去」。如果聯大政委會通過該議案，中國擬在拒絕「先停戰後談判」的前提下，主動提出四項主張，即：一、提議在同意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基礎上舉行有關各國的談判，以結束朝鮮戰爭；二、談判的內容必須包括美國武裝力量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退及遠東有關問題；三、舉行談判的國家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英國、美國、法國、印度和埃及七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即從舉行七國會議起予以確定；四、七國會議的地點提議在中國舉行。備忘錄還提出，七國會議舉行後，可以先討論限期停戰的問

題⁴³。顯然，中國的立場針鋒相對，即堅持在同意撤軍的前提下「先談判後停戰」的原則。對此，斯大林13日回電表示贊同，並希望徵得朝鮮同意。周恩來14日將備忘錄發給朝鮮，並說明蘇聯已經同意⁴⁴。15日彭德懷回電，表示完全贊同⁴⁵。於是，17日晚19時至22時30分，中國外交部分別向朝鮮、蘇聯、印度、英國和瑞典駐華使節遞交了周恩來給聯大政委會的電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封電報，內容同前述備忘錄基本相同⁴⁶。中國為甚麼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而堅持「先談判後停戰」的立場？

1月17日晚，周恩來接見了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 (Kavalam M. Panikkar)，18日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接見了英國代表和丹麥公使，歐非司司長宦鄉接見了瑞典大使，分別向他們解釋中國拒絕聯合國議案的理由。仔細閱讀這些談話記錄，有助於理解中國領導人關於停戰談判決策的立場和動機。

關於「先停戰後談判」的說法——中國反對聯合國議案的主要理由，潘尼迦解釋說，聯合國的建議可能在字面上給人留下這種印象，但這裏的意思是「先原則上同意停戰，然後在談判中具體規定停戰條件以結束戰事」。周恩來答覆，「談判的條件是存在的，但其具體實現當然必須通過談判」，「談判的目的在於停戰」。潘尼迦認為，按照這種說法，「談判也就是假定了停戰的原則，這是很重要的」，中國應該進一步解釋自己的立場。在這裏，印度人實際上提出了「停火」和「停戰」兩個不同概念的問題。周恩來堅持「先談判後停戰」，其本意就是要對方先答應中國提出的政治條件，再談停戰問題。但是，如果雙方不停火（即「原則上同意停戰」），怎麼坐下來談判？

中國反對聯合國議案的另一個理由是中國沒有參加這個議案的討論（這也是蘇聯反對的理由）。潘尼迦解釋說，這個建議是「提請中國考慮的談判基礎，如果中國同意則正式協商」；聯合國作為交戰的一方，不可能先徵求中國的意見，然後再提出建議。周恩來有些退讓說，「這是一個形式上的問題，我們沒有把聯合國看為作戰一方」。問題是新中國在聯合國應有合法地位，而這種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認，「因此我們隨時要提醒這一點」。周恩來說的是實情，也是中國關注的重點，由此便可以理解中國為甚麼要強調先召開七國會議，並特意指出會議召開本身就意味着承認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關於「先停戰是美國政府為了取得喘息時間」的說法，在1月18日與章漢夫的會面中，英國代表解釋說，這是中國的一貫態度，但是英國政府認為停戰並不會造成聯合國軍再開戰的條件。章漢夫仍然堅持認為：美國就是要爭取一個喘息的時間。在這裏，中國決策者忽略了一個重要情況——這個議案是美國投了贊成票的。且不說美國是否需要「喘息」，根據英國代表的說法以及聯合國的程序，可以想見，作為投贊成票的成員國，面對已經通過的聯合國議案，美國出爾反爾所遭遇的政治和外交困境想必遠遠大於它在投票時的尷尬局面。

對於中國一再強調「停火是美國人的陰謀」的說法，潘尼迦透露了一個重要情況：美國是非常勉強地同意聯合國議案的。據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國政府之所以同意，是因為它預料中國政府會拒絕這一建議。這個情況應該讓中國決策者意識到，或許這個停火議案並非是美國人有意鼓動或主動提出的。

從周恩來簡單的回覆「事情並不常常合乎美國的設想」可以看到，他對此似乎已有所領悟。

關於召開國際會議的地點，潘尼迦一再提出「必須選擇一個有中立性的地點，使與會者自在而不感覺到為難」，其中提到了香港、開羅和印度等地。周恩來堅持認為，「這一會議是要解決東方問題，因此在中國最為適宜」。顯然，這一要求是不合情理的，以至瑞典大使在外交部看到中國的文件時就自言自語地說：「嗨，在中國開會！這怕人家不能同意吧！」^{④7}

從周恩來起草的備忘錄以及上述談話記錄可以看出，中國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的種種理由均缺乏說服力，特別是在英、印等國代表作出解釋後仍堅持己見，其真正原因是中國決策者（在蘇聯的支持下）根本就不打算進行認真的停戰談判，至少認為現在還不是時機。這裏，關鍵問題在於中國出兵朝鮮的作戰目標在第二次戰役後發生了重大變化。

入朝作戰初期，中國的戰略目標就是通過打擊敵人，「迫使美國和我進行外交談判」，使戰爭「局部化」，「爭取美帝國主義知難而退」^{④8}。然而，隨着第一、二次戰役的勝利，中國的作戰目標及對停戰和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1950年12月3日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時指出，停戰的條件是美國「必須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④9}。不過，三八線的界限很快就被抹去了。第二次戰役結束時，考慮到部隊作戰能力下降，後勤補給短缺，彭德懷、聶榮臻和周恩來都主張部隊暫停進攻，在三八線以北休整，來年春天再戰^{⑤0}。但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毛澤東當然知道志願軍的實際困難，所以後來又電告彭德懷，打過三八線以後可以再退回來休整，從軍事策略上講，這樣做也有利消滅敵軍。但必須消除人們頭腦中三八線的「舊印象」，必須讓部隊樹立「不消滅韓〈朝〉鮮境內的敵人不回國」的觀念^{⑤1}。其實，從彭、聶、周的建議中也可以看出，他們所說的「休整後再戰」就是一種策略考慮，因為那時中國軍事領導人都為戰場上的勝利所鼓舞，認為美軍並沒有預想中那麼厲害，其戰鬥力還不如日軍。「速勝論」當然未能實現，但假以時日，把美軍趕出或逼迫他們撤出朝鮮半島是不成問題的。

佔領漢城後，彭德懷頂住了金日成和蘇聯顧問要求繼續南進的壓力，下令全軍休整。然而，中國決策層這樣安排，並非是想就此罷手，而是考慮如何為下一次決定性戰役做好充分準備，以徹底打敗美軍。毛澤東在1951年1月14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反覆強調，為春季攻勢做好充分準備的目的，就是為了進行「最後性質」的作戰，「保障最後勝利」，在4至5月「根本解決朝鮮問題」。第二天，毛澤東向斯大林轉發了這份電報^{⑤2}。既然聯合國軍遲早要被趕出或被迫退出朝鮮半島，既然志願軍很快就會大獲全勝，為甚麼現在要進行停戰談判？中國備忘錄中所說可以「討論限期停戰」，就是考慮到志願軍「亟需休整兩個月」，同時「爭取世界人民的同情」^{⑤3}。所以，在1月下旬美國發起反攻而彭德懷提出全軍撤退、暫時放棄漢城和仁川的建議時，毛澤東則認為必須立即發起第四次戰役，繼續南進大量消滅敵軍，然後再進行談判^{⑤4}。

顯然，通過與外國使節的談話，周恩來也意識到中國處理這一事件的策略失當（不應「拒絕」，而應提出「修正」議案）。為了爭取世界輿論，中國外交部以答覆印度大使的方式，於1月22日又提出了一個修正案，主要內容是：一、只要一切外國軍隊從朝鮮撤退的原則被接受，並付諸實施，中國政府將負責勸說志願部隊回國；二、關於停戰談判問題，可分兩步進行，首先在七國會議第一次會議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並付諸實施，以便繼續進行談判，其次，停戰全部條件必須與政治問題聯繫討論；三、必須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⁵⁶。然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美國不會再給中國人留下任何解釋的時間和空間，周恩來的努力淹沒在美國一系列的外交和軍事行動中。

看到中國的答覆後，1月18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奧斯汀（Warren R. Austin）在聯大政委會發表了長篇講話，指責中國接連三次拒絕國際社會的和平努力，蔑視聯合國的和平誠意。奧斯汀還把中國稱為侵略者，呼籲聯大政委會立即研究並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議⁵⁷。19日和23日，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決議，要求聯合國直接宣布共產中國侵略朝鮮，不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入聯合國⁵⁸。30日，聯大政委會否決了印度等十二國關於請中國對聯合國13日停火議案的答覆做進一步補充和澄清的建議。2月1日，在美國的鼓動和策劃下，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政府「在朝鮮從事侵略」⁵⁹。5月18日，聯合國大會又通過了一項實際上是以美國要求為藍本的決議，即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⁶⁰。不過，與美國的外交計謀相比，真正使中國陷入困境的，是美軍在戰場採取的軍事行動。

在志願軍接連擊敗聯合國軍的情況下，美國最初確實考慮過從朝鮮撤軍的問題。但是聯合國軍司令部總司令李奇微（Matthew Ridgway）接手指揮美軍地面部隊後認為，美軍並沒有重大損失，只是士氣低落，而中國軍隊由於缺乏現代化裝備和後勤保障，其連續進攻最多只能維持一個星期。所以，美軍完全有能力守住現有陣地，甚至應該立即組織反攻。1月15日，李奇微就開始了試探性的反攻。在中國拒絕了聯合國停火議案以後，25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隊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隊（總兵力約二十五萬餘人），在空軍支援下，發動了全線進攻。其結果不僅徹底破壞了中朝聯軍休整和準備再戰的計劃，而且使印度等國試圖讓中國再做解釋和繼續呼籲停戰談判的努力變得毫無意義。而此時中國軍隊的狀況，正如志願軍黨委8日給中央的報告所言：「戰鬥單位兵員不足，給養很差，體力削弱，非休整補充，改善運輸、供給，難以繼續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軍隊勉強發起第四次戰役，歷經兩個多月的艱苦戰鬥，雖給敵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聯軍進軍北緯三十七度線（三七線）以南的作戰目標則根本無望。相反，聯合國軍不僅攻佔了仁川、金浦和漢城等戰略要地，而且全線突破中朝聯軍的陣地，再次進佔三八線以北地區。在隨後發動的第五次戰役中，中朝聯軍雖打過三八線，消滅了敵軍幾個師，但沒有達到「粉碎敵人計劃，奪回主動權」的戰役目標，不得不停止進攻，提前結束戰鬥。聯合國軍則於5月20日發起全線反擊，中朝軍隊被迫撤退，並遭受極大損失⁶¹。

與出兵決策的情況不同，中國關於停戰談判的決策前後立場變化很大，開始確定出國作戰的目的就是打到三八線，迫使美國進行停戰談判；後來不接受停戰談判的原因是中朝軍隊必須越過三八線，以實現政治目標；最後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是因為決策者認為可以把美國趕出朝鮮半島，因此不需要停戰談判。如果說美國在戰爭中所犯的戰略性錯誤就在於越過三八線，那麼同樣，中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特別是拒絕停火議案，不僅是軍事戰略上的失誤，也失去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話語權。

四 反思和結論

判斷一項決策正確與否，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看這一決策的結果是否符合當初決策者設定的目標，而決策動機的合理性，則主要看其決策目標是否符合基本的客觀條件。由此出發，對於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以下三個方面的決策，筆者嘗試做一些分析和評判。

一、關於是否支持在朝鮮發動戰爭的決策。就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看不出中國被迫接受斯大林和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決定是否經過中共領導層的討論，以及出於怎樣的考慮。不過，從當時中國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看，無論是領袖個人還是領導集體，中共最後做出的決策應該有兩方面原因：中共既然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就必然要服從莫斯科的領導；毛澤東既然對斯大林不允許中國革命極為不滿，就不應該阻止朝鮮革命，何況中共還是亞洲革命的領導者。這是基本邏輯。

當斯大林把決定權交給中國的時候，毛澤東所面臨的選擇是：如果拒絕，就必然會與蘇聯和朝鮮同時結怨；如果接受，就很可能讓中國面對一次影響經濟建設或安全受到威脅的風險。兩害相權取其輕，毛澤東選擇了後者。此後中國的目標就是把這種風險降低到最小程度，這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初努力使戰爭「地方化」或「局部化」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為甚麼在戰爭爆發後最初要求中國軍隊化裝赴朝、秘密參戰的原因。所以，毛澤東被迫做出的第一次決策無所謂正確與錯誤——沒有第二種選擇，只是對蘇聯與中國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差別和衝突估計不足，也沒有想到斯大林所關注的主要是戰爭的過程而非結果。

二、關於是否出兵援助朝鮮作戰的決策。無論中國出兵決策的過程和動機多麼複雜，人們都不得不承認，這在本質上是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判斷對方真實意圖和己方實力地位的一場心理較量。事實證明，毛澤東的判斷（只要中國出兵，蘇聯最終就要承擔起全部責任）是準確的，做出的決策也是正確的。其準確性在於，中美開戰的第三天，斯大林即下令蘇聯空軍迅速出動，越過鴨綠江赴朝作戰，蘇聯第六十四殲擊航空軍成為與美國空戰的主力部隊。此後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滾滾而來，既有力保障了朝鮮前線的軍備供給，也全面支援了中國國內的經濟恢復和建設。其正確性在於，當志願軍結束第三次戰役時，上述毛澤東賴以決定介入戰爭的四重考慮都已成為現實：

中國拯救了朝鮮，履行了作為亞洲革命領導者所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也大大提高了自身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中國敢於獨自挑戰美國，且能夠擊退美軍，毛澤東的革命激情和反帝信念已經得到充分展示；把聯合國軍趕過三八線，朝鮮成為緩衝地帶，對中國主權和周邊安全的威脅自然化解，甚至台灣問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都有可能得到較為有利的解決；最重要的是，中國出兵朝鮮，解除了斯大林對中共和毛澤東的懷疑^⑥，從而加強了中蘇同盟的堅實基礎，鞏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權。

當然，志願軍初戰勝利帶有一定的偶然性（麥克阿瑟不相信中國會出兵、美軍輕敵冒進），但即使中國軍隊按照原計劃在平壤以北山區構築防禦工事、建立根據地，從而阻擊美軍，中國出兵決策所構想的幾項目標同樣已經達到，只是政治影響小一些。至於所謂「得不償失」的說法，必須看到按照交戰雙方公布的傷亡和失蹤人數，志願軍在整個戰爭中兵員損失達52.29萬人，遠遠高於美軍的14.2萬人，但前三次戰役的損失只有4.72萬人（未計凍傷者）^⑦。也就是說，中國軍隊90%以上的兵員損失不是因為出兵朝鮮造成，而是由於未能及時收兵造成的。軍費開支的情況也是如此，由於戰爭的長期化，中國政府1951年的總預算增加了60%，其中直接用於朝鮮戰場的就佔32%^⑧。1952年9月周恩來訪蘇時請求蘇聯在今後五年中再貸款40億盧布，其中大部分還是用於軍事和國防，購買工業設備的僅有8億盧布^⑨。因此，從中國政治本身來說，出兵朝鮮的決策沒有錯誤，錯誤的是在已經實現預定目標的時候沒有及時做出停戰的決策。

三、關於是否接受聯合國停火議案的決策。1951年1月中國斷然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應該說是一次戰略性的決策失誤。由於這次決策，中國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在朝鮮戰場及國際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軍事等各方面陷於被動局面。導致這次決策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對敵我力量的判斷失誤，其實當時志願軍已成強弩之末，真正需要「喘息」機會的不是美軍，而是志願軍。其次是情報不準，中國決策者根本不知道美國對這個停火議案的投票情況和白宮面臨的尷尬境地，說聯合國停火議案是美國人的「陰謀」，純屬臆想。再次是不熟悉國際舞台的遊戲規則，不了解國際事務運作的慣例和程序，等到周恩來明白「拒絕聯合國議案」的說法用詞不當，為時已晚。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決策者設定了一個超越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這從志願軍的戰術從一次戰役圍殲美軍幾個師的大兵團作戰改為一個軍只圍殲一個營的「零敲牛皮糖」戰法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⑩。

那麼，中國接受聯合國停火議案是否就能夠如願以償地實現停戰談判？或者說，這種考慮是不是一廂情願？這要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來分析。對內而言，不可否認，戰爭中的同盟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的選擇，毛澤東被迫同意斯大林和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決定，與此不無關係。但是必須看到，中國出兵以後極大地提高了自己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地位，也掌握了對於戰爭決策的發言權和主導權。後來的事實證明，只要中國下定決心，莫斯科和平壤最終都會服從北京的決定。對外而言，美軍當時的確對馬上實現停戰談判心有不甘，也想找機會挽回顏面。但是必須看到，美國指揮的是聯

合國軍，其行動在法理上是要經過聯合國批准的。正如英國代表對周恩來說，如果聯合國通過了停火議案，美國反悔的可能性很小。退一步講，即使美國再次挑起戰端，那時中國不僅在道義和輿論上佔有制高點，在軍事上也已經恢復元氣，補充給養，可以整裝再戰了。

註釋

- ① 嚴格講，朝鮮停戰談判和停戰協定簽訂也屬中國介入戰爭的範疇，限於篇幅，本文暫不涉及。
- ② 甚至到1990年代初，仍有研究者相信林彪以健康為由拒絕率軍赴朝作戰（參見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7），而出國作戰的志願軍都是自願回國的朝鮮人（參見Sakurai Hiroshi, “A Survey: Studies on the Korean War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1, no. 1 [1998]: 90）。
- ③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London: Book Club Associates, 1987), 155-56.
- ④ 主要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至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8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至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20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 ⑤ Семина Ю.Н., С.Н. Руба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XX века. Участие СССР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No. 11, 3-20, No. 12, 30-45; Вартанов В.Н. (ред.)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 1950-1953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7; Волохова 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No. 4, 123-31;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No. 5, 79-113. 這些文件很多都被譯成英文，公布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的網站，參見<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
- ⑥ 史料價值較大的著作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u 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增訂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至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William Stueck,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 ⑦ 在朝鮮戰爭中，最典型的的就是1950年10月4至5日、13日和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據筆者了解，對於這三次出兵朝鮮決策的關鍵會議，除了與會者名單，竟無一字正式記錄。

⑧ Paul G. Pierpaoli, Jr., “Beyond Collective Amnesia: A Korean War Ret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76, no. 3/4 (2001): 93. 更多的描述參見 Stephen J.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9-10, 21-24, 56-60。

⑨ 由於缺乏基本史實的支撐，冷戰結束前的爭論已不重要，儘管有些看法對後來的研究不無影響。本文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近三十年來國際學界的各種觀點。

⑩ 冷戰時期關於戰爭起源各種流派和觀點的介紹，參見 Rosemary Foot, “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15, no. 4 (1991): 411-31; Kathryn Weathersby,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Working Paper*, no. 8 (November 1993), 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s/publication/ACFB76.pdf。對修正學派關於戰爭起源觀點的全面反駁，參見 Kim Chull Baum,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A Critique of the Revisionists’ View”, *East Asian Review* 6, no. 2 (1994): 3-22。現在仍然堅持這種說法的只有中國官方史著和個別俄國學者，他們有意無意地迎合了「內戰說」——所謂「朝鮮內戰爆發」的說法，儘管沒有明言，但字裏行間仍在暗示：戰爭是韓國在美國的幫助下發動的。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頁 23-26；Ванин Ю.В. (ред.)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 1950-1953 гг.,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50 лет, Москва: РРО «Первое Марта», 2001, 27-28; Шин В.А.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столет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МГУ, 1998, 134。

⑪ 中國官方一般使用「抗美援朝戰爭」（時間起點在 1950 年 10 月）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避開討論發動戰爭的責任，至少效果是這樣。

⑫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214-15; Kathryn Weathersby, “Korean, 1949-50: 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WIHP Bulletin*, issue 5 (spring 1995): 4; Evgueni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CWIHP Bulletin*, issue 6/7 (winter 1995/1996): 87;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70-75; William Stueck,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73-77; Орлов А.С., Гаврилов В.А. Тайны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3, 48-49; Дрогозов И.Г. Необъявленные войны СССР, Минск: Харвест, 2004, 17-23; Avram Agov, “North Korea’s Alliances and the Unfinished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8, no. 2 (2013): 225-62.

⑬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139;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96-98; Самохин А.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И.В. Сталина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Власть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2010, No. 3, 103-105; Hwang Byong Moo,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XIV, no. 2 (2010): 106; Kim Donggil, “Stalin’s Korean U-Turn: The USSR’s Evolving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24, no. 1 (2011): 93.

⑭ 這裏只補充一個重要史料：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外交官對筆者說，他在外交部檔案館看到了 1949 年 12 月（筆者判斷是 24 日）斯大林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他們都表示不贊同金日成關於主動進攻南方的要求，毛澤東甚至提出以中共熟悉的朝鮮領導人崔庸健替換金日成的建議，但斯大林沒有回應。

⑮ 詳見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34-95。

⑯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a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2, no. 550 (1950): 79; “Crisis in Asia—An Examination of U.S. Polic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2, no. 551 (1950): 111-18.

- ⑰ 〈來自中國的秘密情報〉(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 ф.100, оп.43, п.315, д.142, л.53-54。
- ⑱ 〈毛澤東給劉少奇並轉交斯大林電〉(1949年7月25日)·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40。
- ⑲ 〈羅申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49年11月15日、12月5日)·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36, д.220, л.57-66; АВПРФ, ф.100, оп.36а, п.150, д.4, л.86-87。
- ⑳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9-17。
- ㉑ 〈莫洛托夫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1-7。
- ㉒ 〈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 駁斥美國務卿艾奇遜的無恥造謠〉,《人民日報》,1950年1月21日,第1版;師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54-56。
- ㉓ 〈毛澤東關於海空軍訂貨等問題給李富春等的電報〉(1950年3月2日)、〈關於中蘇專家協定等問題的電報〉(1950年3月)、周恩來:〈關於請蘇聯運空海軍器材給布爾加寧的電報〉(1950年3月22日)、〈關於軍事訂貨事給布爾加寧的電報〉(1950年4月13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二冊,頁137-38、149-50、207-208、299-302;毛澤東:〈關於購買空軍裝備器材致斯大林電〉(1950年4月1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頁132。
- ㉔ 王定烈主編:《當代中國空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78;羅舜初(海軍參謀長)致周恩來函,1951年1月17日、4月16日,個人收藏。
- ㉕ 參見William Stueck,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75; Chen Jian, "In the Name of Revolutio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Revisited", in *The Korean War in World History*, ed. William Stueck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4), 103-104。
- ㉖ William Stueck,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76-77.
- ㉗ 〈聯共(布)中央關於蘇中談判的決議和條約、議定書草案〉(1950年1月22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1-50。
- ㉘ 〈中方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的草案〉(1950年1月26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38-42。
- ㉙ 〈蘇方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及議定書的修改稿〉(1950年1月26至27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73-84。
- ㉚ 〈蘇方對中方的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及議定書修改後的定稿〉(1950年1月28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74-79。
- ㉛ 在1945年7月2日和9日與宋子文的談判中,斯大林反覆強調不凍港和中長鐵路對於蘇聯的「重大戰略意義」。參見〈斯大林與宋子文第二次會談記錄:關於簽署中蘇條約〉(1945年7月2日)、〈斯大林與宋子文會談記錄:外蒙古、中東路 and 新疆〉(1945年7月9日)·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3-17, 28-38。與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蘇聯如願以償,斯大林感歎道:為這一天,蘇聯「已經等了40年」。參見斯大林:〈告人民書〉(1945年9月2日),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438-39。
- ㉜ 〈中方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的草案〉, л.38-42; 〈蘇方對中方的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及議定書修改後的定稿〉, л.74-79。
- ㉝ 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如斯大林所料,1952年8至9月中國提出重新簽訂協定,要求蘇軍繼續留在旅順基地,而且沒有具體期限。參見〈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52年8月20日、9月3日)·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54-72, 75-8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外交部部長 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期限的換文〉,《人民日報》,1952年9月16日,第1版。
- ㉞ 按照岡察洛夫等人的說法,中國對發動這場戰爭「持保留意見」,只是「勉強支持」。參見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213。關於這一點，有些俄國學者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斯大林是在北京和平壤的雙重壓力下才最終放棄原來立場的，但沒有提出任何有力的證據。參見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93-94; Самохин А.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И.В. Сталина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04。*

⑤⑥ 毛澤東與崔庸健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毛澤東與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談話記錄，1956年9月23日，個人收藏。

⑤⑦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⑤⑧ 後來也有學者從另一方向講述了同樣的邏輯，認為中國參戰的決定性因素是來自蘇聯的壓力。參見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78-80;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42-46。

⑤⑨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2-5, 213-20*;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CWIHP Bulletin*, issue 6/7, 85.

⑤⑩ 1950年9月27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的命令是：如果在朝鮮出現了蘇聯或中國軍隊，如果蘇聯或中國發表聲明準備出兵，美軍都不得繼續在地面採取軍事行動。參見“JCS Message 92801 Sent to MacArthur” (27 September 1950), Harry S. Truman Papers, Staff Member and Korean War Files, Box 13, Harry S. Truman Library & Museum。

⑤⑪ 王亞志：〈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前後的一些情況〉，《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頁87。

⑤⑫ 〈斯大林一周恩來聯名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11日)，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ф.558, оп.11, д.334, л.134-35。轉引自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No. 5, 108-109。*

⑤⑬ 〈賴伊致周恩來電〉(1951年1月1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3-00068-01，頁1-2。

⑤⑭⑮ 〈中國政府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備忘錄〉(1951年1月11日、14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四冊，頁34-39。

⑤⑯ 〈中國政府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備忘錄〉(1951年1月11日、14日)，頁37-38，註釋1；毛澤東：〈關於改寫朝鮮停戰和談判問題備忘錄的批語〉(1951年1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頁444；周恩來致柴軍武電，1951年1月14日，個人收藏。

⑤⑰ 彭德懷致周恩來電，1951年1月15日，個人收藏。目前沒有發現朝鮮的回電，但估計也不會反對。

⑤⑱ 〈周恩來與潘尼迦談話記錄〉(1951年1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3-00068-01，頁26；〈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周恩來 覆聯合國第一委員會電〉，《人民日報》，1951年1月18日，第1版。

⑤⑲ 以上談話內容參見〈周恩來與潘尼迦談話記錄〉(1951年1月17日)、〈章漢夫與胡杰森談話記錄〉、〈章漢夫與穆克談話記錄〉、〈宦鄉與阿馬斯頓談話記錄〉(1951年1月1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3-00068-01，頁26-34、35-37、41-45、38-40。

⑤⑳ 毛澤東：〈關於十三兵團部改組為志願軍司令部的電報〉(1950年10月21日)、〈關於朝鮮戰局問題給彭德懷、高崗的電報〉(1950年10月2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77、589；周恩來：〈對朝鮮問題的估計與我們的思想準備〉(1950年11月13日)、〈抗美援朝局勢的發展前途〉(1950年11月25日)，載《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頁92、102-109。

㉑ 毛澤東：〈戰爭應從最壞方面着想〉(1950年12月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頁388。

㉒ 〈彭德懷關於第三次戰役若干問題的建議致毛澤東並高崗電〉(1950年12月8日)、〈聶榮臻關於朝鮮敵情及對我軍部署的意見致毛澤東電〉(1950年12月16日)，載軍事科學院史料叢書課題組：《抗美援朝戰爭·文獻》，未刊(2014)，頁301、313-14；周恩來：〈關於進攻漢城時間問題給毛澤東的信〉(1950年12月

- 9日)、〈關於志願軍兵力和裝備補充等問題給毛澤東的報告〉(1950年12月12日), 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 第三冊, 頁615、625-28。
- ⑤① 毛澤東:〈關於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作戰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2月13日)、〈關於敵軍集中利我殲擊問題給彭德懷的電報〉(1950年12月24日)、〈關於第二次戰役結束後全軍主力後撤休整的電報〉(1950年12月26日)、〈關於打好第三次戰役和準備春季攻勢給彭德懷的電報〉(1950年12月29日),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一冊, 頁722-23、733、734-36、741。
- ⑤②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1年1月15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1-3。
- ⑤④ 〈彭德懷關於對美軍約三個團分三路北進的措施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27日)、〈志願軍必須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28日), 載《抗美援朝戰爭·文獻》, 頁432-33; 毛澤東:〈志願軍必須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 上卷, 頁454-55。
- ⑤⑤ 〈關於印政府對周外長覆聯合國電的詢問 我外交部答覆印度大使〉, 《人民日報》, 1951年1月24日, 第1版。
- ⑤⑥ Warren R. Austin, "U.N. Collective Action Urged against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4, no. 604 (1951): 166-69, 198.
- ⑤⑦ "House Passes Resolution on Communist China",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4, no. 604, 168; "Senate Passes Resolutions on Communist China",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4, no. 605 (1951): 208.
- ⑤⑧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來部長 關於聯合國大會非法通過誣蔑我國的決議的聲明〉, 《人民日報》, 1951年2月3日, 第1版; 〈聯大政委會 在美國橫施壓力下 非法通過美國對我誣蔑提案 阿剌伯及亞洲十二國提案與蘇聯修正案竟被否決〉、〈美帝對美英集團各國施壓力 協迫支持誣蔑我國案〉, 《人民日報》, 1951年2月2日, 第4版。
- ⑤⑨ 〈美國操縱聯大非法通過對中朝禁運案 我外交部發言人嚴予斥責〉, 《人民日報》, 1951年5月23日, 第1版。
- ⑥⑩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 第二卷, 頁190、228-38、254-68、305-58; Matthew B. Ridgway,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7), 179-83。
- ⑥⑪ 後來中國領導人多次談到這一點。參見〈毛澤東與尤金談話備忘錄〉(1956年3月31日), 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 ф.5, оп.30, д.163, л.88-9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No. 5, 107; 周恩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1960年7月14日、15日), 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 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頁302。
- ⑥⑫ The War History Compilation Committee, ed.,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in the Korean War*, vol. VI (Seoul: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81), 577;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編:《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總結: 衛生勤務》(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 1988), 頁316;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 第二卷, 頁44、132、188。
- ⑥⑬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1年11月1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16-19。
- ⑥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頁258; 〈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52年9月3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75-87。
- ⑥⑮ 毛澤東:〈對英美軍在幾個月內只打小殲滅戰〉(1951年5月26日)、〈用「零敲牛皮糖」的辦法殲敵〉(1951年5月27日),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 上卷, 頁490-91、492。